

杨宝林归纳分析了每个朝代的辽宁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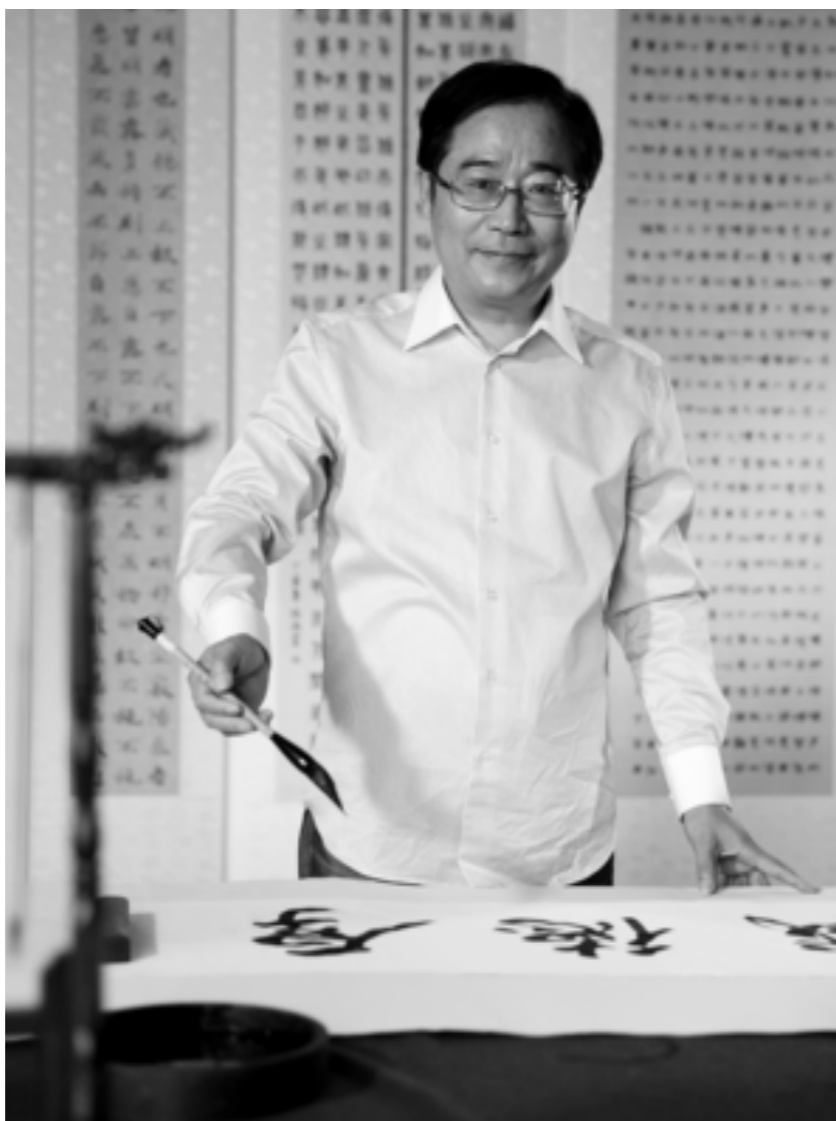
为辽宁书法史研究厘清脉络

□本报记者/杨 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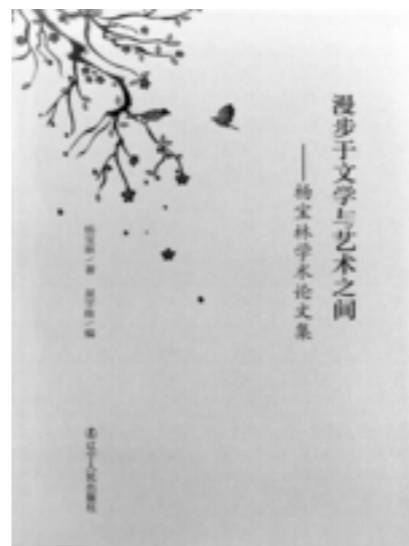
“古典文学研究”“以刘熙载为中心的个案研究”“古典书法研究与当代书法批评”，这些鲜明的学术研究课题与一个人联系起来，这正是杨宝林教授学术论文集《漫步于文学与艺术之间》所要告诉读者的。

近日，杨宝林学术论文集《漫步于文学与艺术之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分为上、中、下编。

此书从杨宝林 30 多年来撰写的百篇论文中精选出 32 篇，内容涉及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地域文化、艺术史学、艺术批评等多个领域，每一篇学术论文的学术性都很强，多有深入钻研后的新发现与新论证，一些见解在学术上有首创之功。



书法家杨宝林



杨宝林作品集封面

《辽宁书法史述评》为研究辽宁书法史提供了清晰的脉络，其中对每个朝代书家的归纳分析是论文亮点，能为地域文化研究提供参考

杨宝林的学术专业主要在古代文学与书法文化上，他也是造诣颇深的书法艺术家，并且特别关注辽宁书法的历史演变进程与中国现时书坛的发展形势，对一些问题的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辽宁书法史述评》《对当下书法重形式轻内容现象的反思》《韩择木籍贯考》《试论书法的意境表现与创造》《对清代碑学的理性思考》等论文都表达了对书坛、书法、书作与文化修养等种种问题的思考。

其中，《辽宁书法史述评》和《韩择木籍贯考》两篇论文都是面向辽宁地域文化的专门研究，不论对于专事辽宁书法艺术的研究者，还是对于普通读者，都

极具参考价值。杨宝林认为，辽宁书法有着悠久的历史，涌现出一大批名垂青史的书法家，像唐代的韩择木、徐放，金代的王庭筠，元代的耶律楚材，清代的王尔烈、高其佩、铁保、魏燮均，民国的王光烈、金毓麟，当代的于省吾、宁齐成、沈延毅等，他们都是书法大家，他们的书法形象，纳兰性德是词人，他们的书法作品都是辽宁人的骄傲。

《辽宁书法史述评》是迄今为止第一篇关于辽宁书法史的长篇论述，颇有学术价值。论文对商周秦汉时期的辽宁书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辽宁书法、隋唐时期的辽宁书法、宋辽金元时期的辽宁书法、明清时期的辽宁书

法、民国时期的辽宁书法、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辽宁书法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是一部辽宁书法史的小史。有专家认为，《辽宁书法史述评》为研究辽宁书法史提供了清晰的脉络，对每个朝代书家的归纳分析是论文的亮点，并能成为地域文化研究提供参考。在大家的印象里，纳兰性德是词人，高其佩是画家，是中国指画鼻祖，而在《辽宁书法史述评》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不仅是词人、画家，还是书法家。

杨宝林研究学问善于寻根问底。值得一提的是，杨宝林对唐代大书法家韩择木的身世作了深入考证。大家都知道韩择木是唐代著名书法家，尤擅长八分书，与

蔡有邻、梁升卿、史惟则齐名，并称八分书四大家。但没人知道他是辽宁义县人，在论文《韩择木籍贯考》中，杨宝林对韩择木籍贯作了考证。杨宝林说，以前学界一直认为最早的辽宁书法家应为金代的王庭筠，韩择木是唐朝著名书法家，经考证是辽宁义县人，这一发现将辽宁历史上书法家出现时间提前了 500 年。

杨宝林还著有《刘熙载年谱》，填补了我国在此项目上的空白，同时，他七年潜心研究撰写的《刘熙载书学研究》一书，是研究清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刘熙载书学思想的代表作，曾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他也成为辽宁第一位获得此奖项的专家。

书法热持续 30 年来，确实涌现出一大批书家，但缺少书法大家。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底蕴不足，这也是当下书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

书法热持续 30 年来，确实涌现出一大批书家，这是可喜可贺之事，但是却缺少书法大家。当下书坛热闹的背后，实藏隐忧，文化的缺失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如错别字连篇，不明词意而生搬硬套以及胸无点墨等。这些都是制约书法发展的瓶颈。杨宝林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

《对当下书法重形式轻内容现象的反思》《对当下书法文化缺失的隐忧》是两篇针对性极强的论文，其文直指当下书法界应特别注重书法艺术文化提高的

问题。杨宝林说，文化底蕴不足是当下书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书法与文化的脱节，或者说就是书法的文化缺失。文化本是广义的概念，这里仅指一般的文化知识，如文字、词语以及文史知识和古代的典章制度等等，是取其狭义，也就是对书家要有最起码的文化要求。书法是传承文化的，是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这对于古代书家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古代书家大都是文人学者，文化和书法是合二为一的。而当下书坛则不然，

书法与文化已渐行渐远，大多书家已蜕化为专门写字的人。放眼当下书坛，错字病语屡见不鲜。书法业内人士文化素质不高是文化缺失的主要因素。

在众多艺术门类中，从事书法创作的人最多，似乎能拿笔写汉字的人都可以写书法。除了各省市书协，还有行业书协，会员人数有几十万。这么多会员难免鱼龙混杂，文化素质良莠不齐，由于一些书家文化水平不高，对书写内容领悟不到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文化差错是难免的。而一些书家急功近利思想严重，也导

致书家重技轻道，不愿读书。各级各类书法提高班、冲刺班如雨后春笋，但这些书法班基本上是讲技法，目的是为了参展参赛，几乎没有讲文化课的。这种揠苗助长的方式，也客观上把书家引上了重技轻道之路。杨宝林对当下书坛文化缺失现象深有感触，为使书法回归文化，重回健康发展之路，他认为，避免文化缺失的好办法就是读书，如果当下书家都能潜心读书，少些浮躁心理，书法就能向文化回归，文化缺失的情况就能有所改变，书法也必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目前，学界对辽宁书法史的研究非常薄弱，而杨宝林的 16 件作品，如史书般地记载了辽宁书史的诸多内容，相信这将对弘扬地域书法起到非常重要的佐助作用

杨宝林的研究方向总是把读者的需求放在首位。他的文章不空洞，有针对性，他的理论也重在抓到根本。同时杨宝林又能将理论的氛围激活，他动用各种艺术因素来探索书法，这些特点对于一个书法理论家、书法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他在全国第八届书学理论研讨会获一等奖的论文《大文艺观视阈下的刘熙载书学略论》。这篇文章之所以能获得书法理论最高奖，关键一点是他将古典书学理论放在儒释道大文艺观下进行思考，这其中有着作为文化人的一种特殊的使命意识。

杨宝林是从文俊先生门下的博士，“从家军”被誉为当代中国书坛理论与实践结合最强的队伍，杨宝林就是这支队伍里的佼佼者。他常说：“书法，最终写的是学问，学问才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精髓。”

杨宝林对辽宁书法史的研究不仅写在论文里，也写在自己的

书法作品中。9 月 16 日，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文墨相兼——杨宝林书法作品展”上，“八大板块”中的“唐代辽宁有大家——辽宁书法史”，就是把他的多年研究的辽宁书法史的论文中部分文字用书法写出来，这一板块共有 16 件作品，基本上勾勒了辽宁书法史。辽宁的书法史源远流长，从石刻可以追溯到三国的《? 邱位纪功碑》和东晋的《好大王碑》，从书法名家可以追溯到唐代的韩择木，古代辽宁书法史可谓群星璀璨，历代书家不胜枚举。杨宝林在辽宁书法史这个板块中分别以“辽宁书法家族”和“辽宁书法之最”等为主题，尽可能多地涵盖历史上的辽宁书家，用自己独具文雅书卷气的书作铭记这些书家的生平事迹与书史流传。

目前，学界对辽宁书法史的研究非常薄弱，而杨宝林的这 16 件作品，如史书般地记载了辽宁书法的诸多内容，相信这将对弘

扬地域书法起到非常重要的佐助作用。中南大学教授、书法研究生导师向彬说，对于杨宝林教授而言，数十年研究文史，对李贺、李煜、苏轼等人的诗学研究颇深，又对刘熙载的书学深入探究，或许正是这些学术的支撑，加上其才学的滋养，他的书法作品中流露出时人少有的沉稳与静穆，也流露出发自其内心深处的气与文气。

《漫步于文学与艺术之间》一书的编辑吴宇栋说，无论是古典文学研究还是书法艺术研究，强有力的文献资料永远是杨宝林学术论文的重要核心内容。文献就是杨宝林学术研究的“利器”，以历史文献作为阐述的依据，这是历代文史学者秉承的学术传统，而面对当今学界出现了许多以理论说现象、以观点论观点的乱象，他依旧遵循以文献说现象、以文献说观点。以文献说现象的代表性文章《对当下书法重形式轻内容现象的反思》，即

是基于传统书法文献记载来探秘传统书法文化，从而有力地评判当代书法乱象。以文献说观点的代表性文章，如《一篇珍贵的关于〈红楼梦〉作者的文献》一文，以一篇尘封百年的关于《红楼梦》作者的文献来为红学界“作者之争”提供佐证材料。杨宝林的学术研究根基就是历史文献，用杨宝林自嘲的话说就是：“这本书要说亮点是没有的，真要说亮点也就是我的论文基本上是基于历史文献进行研究的，没有臆测。”

著名学者王向峰以《学术的进取与文化的裁量》为题在《漫步于文学与艺术之间》作序，他在序言中写道：“宝林在多年中精心致志地攻读典籍，精求学问，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在书法理论与创作实践上又各有硕果收成。他的这部《漫步于文学与艺术之间》正是他走向更为深远的学海的过渡舟楫，前方正在等待。”

文艺微评

编者按：说起戏迷票友，老先生居多，传统戏曲和快节奏生活的年轻人好像隔着些什么。如何让年轻人走近传统戏曲，培养更多年轻人喜爱传统戏曲，让他们在戏曲欣赏过程中不仅欣赏艺术之美，也体会中华文化之精髓？听听评论家们怎么说。

戏曲求变 炫技技能大于情感

□刘新阳

我接触的青年观众，往往在欣赏传统戏曲时发出离自己生活“太遥远”的感慨，例如，什么叫“起霸”？“走边”等程式性动作作讲的是什么？

茫然，是青年观众不愿接触戏曲的原因。

从演出现状看，舞台实践机会偏少，使得当前戏曲表演艺术整体水平普遍下降，表现力和感染力都没发挥出来，阻碍了观众欣赏戏曲。

过硬的程式性技巧虽然在舞台上完美展现，观众喝彩，同行赞许，但单一的技巧，如果顾罔和剧情、人物的关联，甚至让技巧凌驾于剧情和人物之上，最终只会沦为看点。有看点固然好，但是，戏曲不能放弃塑造人物和表达感情——不论是古人还是今人，人类的情感接受是共通的。要想让技巧在纯熟的基础上具有更高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必须在生活积累中找到真实可信的情感依托，使观众为之感动。

形式与内容、程式与情感的结合，生活到技巧，技巧再到情感的生发，是戏曲面临困境最重要的“自救”方式。只有让人物在舞台上鲜活起来，才会让包括青年人在内的观众看懂、感动，进而对戏曲产生“并不遥远”的亲切感和认同感。一句话：戏曲艺术的魅力不在于炫技，而在于运用自身艺术手段进行情感表达、情理、技三者要和谱统一。

够“青春”才能对话青年

□张 倩

青春版《牡丹亭》横空出世时，曾一票难求，吸引了大批青年观众。接下来，全国上下不同剧种的戏曲经典剧目纷纷披上“青春版”的外衣，中国戏曲空前热切地期盼着打通与年轻人的链接渠道，迫切地想把青年人请进剧场，留在剧场。

戏曲的传承需要与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对话，但如今的戏曲却一直在苦苦追寻着对话的“谈资”。青年观众是当今社会综合审美的主体，审美心理定式以及审美习惯的养成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戏曲的未来。因此对于“谈资”的追寻也愈来愈紧迫，而所谓的青春版戏曲，正是在寻找这种“谈资”路上的产物。

青春版戏曲大概是用“青春”的方式展现古典戏曲的艺术风格和审美韵味，试图激活戏曲发展的新动力，培养更多的观众，目标很明确地锁定了 80 后、90 后，因此演员阵容年轻，扮相清丽时尚，舞台呈现追求简约的华丽、婉约的唯美，渴望既能体现戏曲的古典风貌，又能彰显时代特征，从而更加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口味。

从观众接受层面来看，这么做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青年观众对于传统戏曲固有的陌生感和对峙感，毕竟走进剧场已然是一种进步，至于能不能留住观众，还是要看内涵和表演功力了。

吸引新戏迷 创新是关键

□刘艳妮

作为程派第三代传人，张火丁的戏曲可谓老少皆宜，上有老戏迷百听不厌，下有“小灯迷”众星捧月。张火丁能把程派京剧的代表作《锁麟囊》《荒山泪》《春闺梦》等演绎得淋漓尽致，深入人心，她的艺术修养与表演天赋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她能根据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在把握程派艺术精髓的基础上，巧妙结合现代戏的特点，创新传统京剧的表现形式，实现不同艺术风格的有机统一。她与团队创新编排了《秋江》《白蛇传》《绝路回苍天》《梁祝》《江姐》等，填补了程派京剧现代戏的空白。在《江姐》中，张火丁将歌剧中的音乐元素用在程派唱腔中，又结合个人的艺术风格，完美诠释了江姐正气凛然的英雄气概，剧中的经典唱段《红梅赞》等在戏迷中广为传唱。张火丁集各家之所长，大胆吸收多种艺术元素，创新发展程派艺术，使得“程派张韵”更具独特魅力与时代特色，这才深深吸引着“灯迷”们。

在传统戏曲式微的今天，张火丁依然能够吸引大批的“粉丝”走进剧院听曲看戏，形成独特的“张火丁现象”。新时代需要更多像张火丁、王少瑜这样的文化偶像，为当下的观众带来高品质的精神食粮。

文艺微评投稿邮箱
lnrbfbfk@126.com

一剧一评 YIJUYIPING

在历史的重影中注视海瑞

——我看新编京剧《青天道》

□苏妮娜

在省第十届艺术节上，有幸观赏了沈阳京剧剧院近年来蜚声全国的剧目《青天道》。此剧在之前的中国京剧艺术节上演出，赢得一片叫好声。沈阳京剧院传承的是京剧中的唐韵一脉，唐派，即“南麟北马关外唐”中的“关外唐”。近些年来京剧院最火的是名角常东，常东在《青天道》中重新诠释了那个震古烁今的人物：海瑞。此剧的叫好和卖座，对于市场的占领，对新老观众的“吸睛”，既意味着古老京剧仍在继续焕发神采，也意味着一个剧团以及辖下京剧从业者的生存能力和发展空间的拓展。这其中的辛勤和汗水，恐怕是外人难以想象的。缘此，《青天道》这一主打“历史剧”的“新编”，主要从京剧内容上下功夫，承担着既求生存，又图发展的双重重任。

《青天道》讲述的是清官海瑞的故事。与上个世纪末电视剧领域最受欢迎的纪晓岚的故事、刘罗锅的故事、包青天的故事相比，海瑞的故事并没有大规模地出现在影视等现代媒体上，也没有大火特火、街知巷闻，但却常在评书里或是在戏曲当中被“重述”，这似乎意味着，海瑞的故事属于“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那种流行。如果再往前回溯，《大红袍》等老折子也就是从清末流传下来的戏，也是讲海瑞的。因此，重新讲述海瑞，不仅是对明末清初的历史时段的回溯，同时也是对“讲述的再度讲述”。用著名学者戴锦华的话说，这是历史的多重显影。

搁置叙事与历史的“迷思”，我们还是回到眼前的故事：沈阳京剧院的《青天道》聚焦在海瑞出任后的一个时期，“笔架山”“海刚峰”的诨号来自于他宁折不弯的执拗脾气，而这一心性高洁、目下无尘之人，恐怕在日常交往中亦常常为人所忌惮，更遑论明清官场这一类场所，如何有说服力地表现他“当官”“升官”的过程，而不是过去以表现“罢官”为重点，算是改编内容方面的“出新”。明清官场本就是官官相护的利益圈层，而官官相护只是一个表面的壁垒，更为深层的是在官场保护伞之下任意见财敛政、结党营私的污点。海瑞如何能进入这一壁垒内部成为官场上清流，或者说成对峙、监督甚至是毁灭已经结成的庞大势力，这本身就是很有传奇性的，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也许正是因此，这么多年的民间故事和戏曲中始终有他的身影。《青天道》的人物性格与情节设置的“出新”还在于，把海瑞的入仕故事与他刚直不阿引起的忌惮做了一个“逆向思维”式的关联。事实上海瑞也经历了一个“政治智慧”的成长到成熟阶段；他任兵部的教学小吏时，骨头虽硬，但缺少弹性和韧性，一旦遭到排挤立刻萌生退意；到了“逆向上升”的淳安县县令之时，虽然骨头更硬，敢于鞭打顶头上司家的不肖子，扣押明更是上级搜刮用来孝敬的钱财，但显然更讲究谋略，学会揣度对手的心态，攻其软肋。刚直的海瑞身上，蒙上了一层传统儒家理想人格的色彩。海瑞形象的塑造，事实上反映了几百年来人们对于政治清明的渴望，对人格修养的理想。中国需要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的人来行使权力，而这个行使权力的依据应该是民意。从某种程度上，海瑞之所以在历代的改编或曰改写中越来越脱离他在历史上被记载的那个“真实”人格，那个因严苛而近于刻板、因忠直而漠视亲人的形象而回到了“人”本身，这归根结底是当代观众的需求。在他严厉的外表下包含着丝丝狡黠、一点犹豫、一丝脆弱，这种改写使得矛盾冲突的层次更丰富而细腻，更提纯了海瑞性格中的人文理想——是的，不仅仅是政治理想，他也可以同样合乎人文理想。中国人的精神结构和文化心灵的金字塔尖上，放置的是“理想人格”的终极追求。

“历史”而需要“新编”，并不罕见，倒可以说是一种传统，是讲述中国的一种很常用又极深刻的方式。浅表地说来，“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创作历来是为现实服务，讲述历史也是为了今天的人，而不是为了重温古人的高冠博带。时序轮转，到了今天，电影、电视、戏剧讲故事的领域对历史至少有两种心态是遭人诟病的：一是割裂过去，一笔勾销式的“虚无历史”；另一种是夸张娱乐化的“戏说历史”。这两种看轻历史的虚构式讲述，也出于“为时”或“为事”的创作心态吗？并非如此简单。当然，我们可以简单地归因于文化消费的浪潮，不过，即便在前消费时代，在电灯没有普及的时代里，中国人也是拿历史当睡前故事听的。越到近现代，人们面对历史的心态就越复杂：一方面明知历史是叙述的，但是另一方面又提出“失事求实”的改编原则，惯性地把真实作为衡量历史剧乃至历史人物的尺度。可以说从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的原则，到“失事求实”之间，已然出现对于“讲述历史”这一观念的进步。不过，到了今天，我们还是可以进一步追问：假如已经被叙述过的历史不值得信任，那么再度被叙述的“新编”当中，又何以把真实作为依据，这真实又是如何被确定和判断出来的呢？这些都是很有趣的问题。这大概是另一话题了。不过，至少《青天道》这一类的新编京剧，还是遵照了“尊重历史”的路子。

(作者系省文联理论研究室《艺术广角》编辑)



《青天道》剧照